

西藏农牧民贫困特征、类型、成因及精准扶贫对策^{*}



高 星 姚予龙^{**} 余成群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西藏贫困农牧民面临着收入增长慢、生存环境差、占有资源少、健康状况弱、劳动力素质低的困境。贫困人口类型复杂，包括生存环境脆弱型、生产资料贫乏型、经营意识薄弱型、人口压力过大型、人口健康缺陷型、多重因素复合型等。要紧紧把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体思路，结合“两项制度衔接”政策，走出一条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精准脱贫路径。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整村推进”、“合作社+”、“龙头企业+”、“科研基地+”等扶贫开发模式，提高精准扶贫效果。重大扶贫措施是：推进民生大力改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带动贫困农民就业增收；强化劳动力素质培养，增强农民就业能力；构建科技下乡服务体系，提高农牧民科学生产水平；稳妥实施移民搬迁工程；整合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开发综合效率。

关键词 西藏农牧民，贫困类型，贫困原因，精准扶贫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6.03.008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央和各对口援藏省区的大力支援下，在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实施了一系列脱贫致富重大工程，广大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贫困程度大大减轻，扶贫开发成效显著。但是，由于西藏平均海拔高、气候寒冷、生态脆弱、环境恶劣^[1-3]，加之从农奴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广大农牧区的基础设施等民生条件相对薄弱，产业水平相对较低，部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落后，全区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高寒地区、边境地区等仍有一部分农牧民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西藏自治区要实现广大贫困农牧民彻底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仍然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必须根据西藏实际探索适宜的精准脱贫措施。

^{*}资助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3BAC04B03），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项目（KFJ-EW-STSO70）

^{**}通讯作者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6年2月19日

1 西藏农牧民贫困人口与特征

1.1 全区贫困人口构成与分布

根据西藏自治区各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统计，按照年人均纯收入 2 300 元的贫困线标准，全区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0 年的 83.3 万减至 2014 年底的 67.41 万，全区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从 2010 年的 34.42% 降至 2014 年底的 28.59%。其中，大部分家庭具有一定的劳动和致富能力，可以在政府扶持引导下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脱贫致富，这部分人口约 55.98 万人，占全区贫困人口的 83.04%；另外一少部分家庭或者为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病人老人孩子多、或者无子无女的低保户和五保户，他们长期依靠民政低保政策“兜底救助”，这部分贫困人口约 11.43 万人，占全区贫困人口的 16.96%（表 1）。

日喀则市、昌都市、那曲地区和山南地区是全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日喀则市贫困人口 193 180 人，占全区贫困人口的 28.66%；昌都市贫困人口 192 183 人，占全区贫苦人口的 28.51%；那曲地区贫困人口 114 040 人，占全区贫苦人口的 16.92%；山南地区贫困人口 72 460 人，占全区贫困人口的 10.75%（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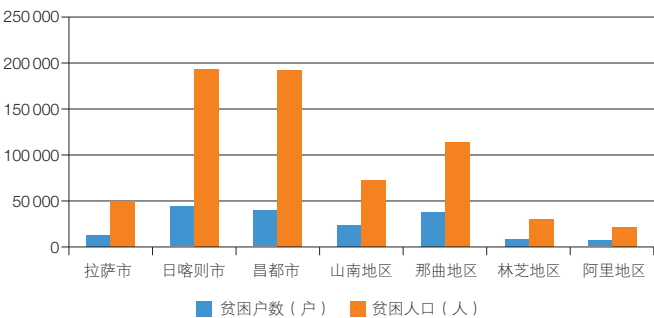


图 1 2014 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区贫困家庭及人口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扶贫办、西藏自治区民政局

1.2 西藏农牧民贫困基本特征

（1）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慢，相对贫困多。多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投入，明显增加了西藏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完善，“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上”类型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西藏农牧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比还有较大差距，2014 年全区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为 7 471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2 421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7.1%（表 2）。特别是贫困农牧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依旧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等传统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明显较少，家庭生产和生活物资积累少，自我发展能力差。长期受到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生产难、发展难和收入低的困扰。

表1 2014年西藏自治区各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统计表

地区	总户数	总人口数	一般贫困户		低保贫困户		低保户		五保户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全区	172 720	674 115	91 468	385 029	45 765	174 772	29 019	106 025	6 468	8 289
拉萨市	13 054	50 570	8 193	33 230	3 345	14 042	897	2 624	619	674
日喀则市	43 763	193 180	25 661	121 639	11 399	49 483	6 037	21 203	666	855
昌都市	39 689	192 183	19 534	102 249	6 819	31 724	11 669	55 609	1 667	2 601
山南地区	23 613	72 460	11 730	40 011	4 639	15 247	5 720	15 476	1 524	1 726
那曲地区	37 640	114 040	18 173	56 813	15 414	49 648	3 078	6 373	975	1 206
林芝地区	8 136	30 004	4 969	19 986	1 512	5 917	920	3 177	735	924
阿里地区	6 825	21 678	3 208	11 101	2 637	8 711	698	1 563	282	303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扶贫办、西藏自治区民政局

表2 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单位：元/人）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国人均纯收入	5919	6799	7916	8998	9892
西藏人均纯收入	4139	4904	5719	6578	7471
西藏与全国差值	-1770	-1795	-1197	-2320	-2421

资料来源：根据《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整理

（2）贫困人口占有资源少，生存条件差^[4]。由于高海拔、气候寒冷、环境脆弱等自然条件限制，贫困家庭人均资源量少，特别是赖以生存的耕地、草场、牲畜等的占有量明显少于一般户和富裕户。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灾害多发、易发地区，自身抗灾能力弱，靠天吃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差，2014年全区有24.12%的贫困户存在饮水困难，16.56%的贫困户未通生活用电，17.26%的贫困户未通广播电视，15.92%的贫困户居住在危房中，43.46%的贫困户无卫生厕所，昌都市等地区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高发。这些困难导致贫困户发展能力差、财富积累少，难以应对家庭变故，一遇到冲击（疾病、灾害、分家、上学）极易返贫。据自治区扶贫办调查，全区脱贫后返贫率平均在20%以上，灾害频发区在30%以上，局部灾区达50%以上。

（3）贫困家庭生育无计划，健康状况差。贫困家庭的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劳动者就业层次、劳动力素质等存在突出问题，人口生育过多、营养不足、卫生条件差，患病、残疾等情况突出。

（4）贫困人口分布偏、远、散，脱贫难度大。总体来看，贫困人口多分布于偏僻、边远、边境等远离城镇和交通干线的山区、高寒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道路不通或不畅，医疗、教育、能源、供电、通讯等公共服务不到位，生产生活条件简陋落后，因此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极大。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的贫困人口发生率高达42.5%。

2 西藏农牧民贫困类型及成因

2.1 西藏农牧民贫困类型与表征

（1）生存环境脆弱型。主要分布在山区、高海拔地区、高寒缺氧等生产生活环境较为恶劣地区，部分人口所处地区由于受到地震、滑坡、高寒、地方病等威胁甚至不适于人类居住，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农牧民生计不可持续。这种类型的贫困家庭在西藏属于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以昌都、那曲、日喀则、阿里地区为多。

（2）生产资料缺乏型。与富裕或者平均收入水平的农牧户相比，赖以生存的耕地少、草场少、牲畜少，脱贫致富的物质基础条件差。一部分家庭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几十年前土地、草场、牛羊等生产资料承包经营时分得较少，虽然家庭人口增加，但土地和草场承包数量不增，“人地矛盾”愈发紧张，发展后继乏力；一部分是由于结婚后分家单过等原因建立了新的家庭，耕地、草场、牛羊等牲畜分得较少，拖拉机、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也较为缺乏，甚至通过借贷和赊欠等方式新建房屋、购置家具和生活用品等，家庭生计入不敷出。

（3）人口生育过多型。缺乏节育避孕措施，家庭生育子女多，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幼龄、学龄子女多，壮年劳动力少，家庭经济负担大。由于需要占用劳力照顾老人和孩子，家中劳动力既无力扩大生产规模，又不能外出打工就业，经济收入十分有限。

（4）人口健康缺陷型。主要是由于家庭人口中有残疾人、大病患者或者地方病患者，或者遇到重大变故出现伤亡，家庭开支长期或急剧超负荷支出，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窘境。这种类型贫困家庭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弱势者，如果没有外力救助，其家庭会陷入绝对贫困。尽管西藏已经实施农村医疗保险、大病救助、民政低保救助等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个别家庭成员的健康缺陷会长期影响家庭所有成员的生活质量，严重拖累全家脱贫致富的能力。

(5) **多重因素复合型贫困**。西藏贫困农牧民家庭类型具有复杂性、多重性特征,多数家庭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类型,而是两种或者更多种类型同时存在的复合型贫困。如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贫困家庭同时存在脱贫致富意识不强、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可能存在生产资料缺乏问题,还可能存在生育人口过多、家庭负担过重的问题,还可能存在家庭人口疾病、劳动力不足等类型。多种贫困类型并存、多重致贫因素叠加,是西藏农牧民贫困的典型特征,也是西藏2020年和全国一道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巨大挑战。

2.2 西藏农牧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1) 恶劣的生态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危害着农牧民的生命健康,也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 农牧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医疗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足,使得贫困农牧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致富能力。

(3) 贫困农牧民固守种植和放牧等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严重依赖于耕地、草场、牲畜等,生产经营方式依然落后,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牧民增收渠道狭窄。

(4) 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就业能力差。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区域,义务教育机会少、程度低,职业技能教育严重缺乏。

(5) 部分群众安于现状,缺乏致富意识。受传统思想影响,西藏部分贫困群众思想保守,不愿出外打工,较难融入市场经济;部分农牧民向政府伸手要钱要物、等待救济的依赖思想严重,有钱花光、有肉吃光;部分贫困群由于宗教信仰,对牲畜惜杀惜售,饲养牲畜超载过牧,无法兑现为实际收入。

3 西藏精准扶贫路径与对策

3.1 精准扶贫的关键路径

(1) **制定适宜评价指标,精准识别贫困户**。① 精准识别贫困户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前提。实际工

作中,完全按照人均纯收入标准识别贫困户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5],必须结合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各地特点制定一套适宜的贫困户精准识别体系。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卡孜乡结合“两项制度衔接”政策,在对贫困户和低保户建档立卡登记中总结了一套可行的指标体系。该体系构建了作为家庭主要财富的耕地、劳动力、粮食、牲畜、农机具和房屋6大指标,每一指标再细化若干指标项,组织专人入户统计各个指标项,各指标项折合成现金合计为各户资产总额,作为确定贫困户和低保户的重要依据。② 识别过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自愿申报贫困户、公开清点财产、公开民主评议、公开认定结果和及时建档立卡等工作。做到不漏掉一个贫困户,也不虚报一个贫困户。

(2) **针对扶持对象特点,精准帮扶贫困户**。帮扶到户、差别到人是扶贫工作实现公平公正的唯一途径。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出来后,将扶持对象分为两类实行差别化帮扶。第一类是残疾、病患、年老体弱、智能偏低、经济基础较差的严重困难户。因为无能力发展产业项目,要采取点对点的帮扶,差别到人,给他们“吃偏饭”,在帮扶方面适当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按照定对象、定目标、定政策、定措施、定责任的“五定”要求,把资金、政策和具体措施等精准“滴灌”到贫困对象身上,确保帮扶到户工程达到预期目的。第二类是有能力有意愿发展项目产业的农户,因其智能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在结合大多数群众意愿,确定帮扶项目或选准帮扶产业后,可以采取推进式帮扶。如通过以奖代补、提供种苗、提供小额贷款或贴息,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引导贫困农户发展种植、养殖或旅游服务业,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同时,特别要注重同步发展专业合作社,以提高贫困群众的组织化水平,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3) **动态跟踪扶贫对象,精准管理扶贫过程**。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工程,必须加强监测评估,实行动态管理,完善“进退”机制,切实提高针对性和

实效性。对贫困农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年终根据扶贫对象发展情况，对扶贫对象进行调整，使稳定脱贫的农户及时退出，使应该扶持的扶贫对象及时被纳入，从而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扶贫信息真实、可靠、管用。确保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中、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扶贫。

（4）加强扶贫监测评估，精准考核扶贫效果。严格执行全区农村贫困监测制度，不断加强贫困监测，建立精准的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测和评估，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和验收，确保项目质量、资金安全和项目效益。深入了解贫困特点和原因，不断提高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使扶贫帮困真正扶到关键处、帮到点子上，切实增强扶贫工作成效。

3.2 精准扶贫创新模式

（1）整村推进模式。针对西藏自治区贫困范围大、贫困人口多，区域性贫困问题极其突出的特点，必须要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集中力量解决影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最突出制约因素，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整村推进”的重点是改善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事业、村容村貌等生产生活条件，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农户逐步走上致富路。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和结对帮扶到村到户。

（2）“合作社+”模式。西藏农牧区贫困农户自组织能力差，发展现代农牧业缺乏资金、技术、智力，必须通过建立合作社把农牧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种模式有“合作社+能人+一般农户+贫困户”形式，也有“党支部+合作社+能人+一般农户+贫困户”形式。合作社可以是专业生产合作社，如奶牛生产合作社、毛毯地毯加工合作社、藏香唐卡合作社；也可以是集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村合作社。

（3）“龙头企业+”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以政府通过一定的资金扶持和引导，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吸收贫困农户劳动力加入企业生产，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如南木林县通过财政资金和扶贫资金以及提供优惠土地政策，扶持南木林岗珠藏香厂扩大经营规模，重点招募残疾人和贫困家庭人口来厂就业，该厂员工总数40余名，80%的工人是残疾人。林芝地区米林县扶持龙头企业生产灵芝和藏草药，技术人员由外地引进，一般劳动力则大量雇佣本村农民。

（4）“驻村工作队+贫困村+贫困户”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发挥自治区驻村工作队所属单位的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优势，通过工作队引进扶贫项目、扶贫资金、扶贫物资、致富能手、实用技术等，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对口帮扶。

（5）“行业（项目）+贫困村+贫困户”模式。主要是引导自治区、地区（市）等各部门利用行业部门优势，针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定点帮扶的模式。如自治区交通部门整合资金，改造建设溜索项目，自治区金融机构为农牧户提供小额贴息贷款项目等。

（6）“科研基地+”模式。这种模式是依托区内外科研机构，在贫困村设立科研试验、示范、推广基地；同时组织农牧民利用耕地、草场、牲畜、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与适宜的科技要素重组整合成新的生产要素；通过培育农牧民新型合作经营组织、构建农牧结合技术体系、提升农牧民技能等一系列工作的融合，实现全方位整村推进，建成西藏农区现代可持续生态畜牧业发展典型样板，为农牧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并建立增收的长效机制。如中科院和西藏自治区联合共建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引导山南地区贡嘎县岗堆镇吉纳村251户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建设350余亩人工草地，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集中育肥肉羊，开展现代农牧结合的适度规模经营示范。2013年合作社实现现金分红，户均增加现金收入1234元。草业中心还在林周县白朗村，帮助村民引种了黑麦草、绿

麦草等优质牧草,带领农户改良草地,修建水渠,采用放牧加补饲绵羊养殖技术,绵羊出栏率从11%提高至30%,原本退化的草地产草量提高两倍。

3.3 精准扶贫重大措施

(1) 强力推进民生改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产品短缺是制约西藏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6],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既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又能够为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①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五通”(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五有”(有学上、有医疗保障、有科技文化室、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强有力的村级领导班子)和“五能”(能用上安全饮用水、能用上电、能有一项以上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生产项目、能有安居定居房屋、能及时得到培训和获得信息)。以“整村推进”为目标,实施土地整理项目、农田水利工程、病险水库加固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改厕改圈工程、抗震安居工程、饮水安全工程、村村通公路工程、广播电视电话村村通工程。② 健全完善幼儿教育和直到高中的免费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加强县、乡、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软硬件建设,提高基层医疗单位诊治水平,解决广大农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全面提高农牧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③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贫困人口的大病救助制度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农牧民“养老、贫困、患病”的后顾之忧,彻底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承受能力,遏制因灾致贫、病残致贫等返贫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2) 引导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带动贫困农民就业增收。产业扶贫是贫困群众依靠产业发展促进增收的重要手段,是贫困群众由“输血”向“造血”转变、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① 围绕“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群众主体、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创新产业开发方式,拓宽项目选项渠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规模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② 鼓励龙头企业肩负起标准化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推行联户经营型、股份合作型、土地和草场流转型、基地集中型、村企业共建型、租赁经营型、参股经营型多种产业扶贫模式,实行以资折股、入股分红、利润到户,形成贫困群众与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③ 推动产业规模发展^[7]。引导贫困群众将草场、土地、牲畜经营权向产业大户、农牧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流转,积极推进设施农牧业和标准化示范基地的创建,推动各种生产要素适度集中,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规模经营。强化基地建设、品牌建设,突出资源整合,瞄准牦牛、蔬菜、藏药材等优势产业,按照“一次规划、分批投资、逐年建设、做大规模”的原则,集中资金对优势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建设一批综合生产能力强、加工增值潜力大、辐射范围广的产业基地。打好生态、无污染和绿色、有机牌,加快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村、示范户,提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3) 强化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引导广泛就业。努力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与生产技能。对农牧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专项技术培训,力争使每个贫困户至少掌握一、两门脱贫致富技能,增强自我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能力。

(4) 构建科技下乡服务体系,增加农牧民科学生产能力^[8]。① 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科技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农村各级、各类科技协会的作用,举办各类培训,开展科技咨询和科普宣传活动。加强、充实和培养基层科技干部,培养本土化的科技特派员。② 依靠科技培育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引进先进适用的加工技术,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地方特色和优势,创立品牌、

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③ 加强科技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互联网、电视为主体，建立高效、实用、便捷的科技服务信息平台。

（5）稳妥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对于地方病和自然灾害易发、多发、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特殊贫困地区的贫困农牧民，可以尝试动员搬迁的方式在异地建设新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应严格按照“政策引导、群众自愿、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有序安置”的原则，坚持移民搬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强化规划引领，整合涉农等多渠道建设资金和项目，要重点解决好与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条件，帮助贫困群众走上致富之路。

（6）整合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开发效率。积极构建政策扶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援藏扶贫、社会扶贫“五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充分统筹整合各项资源，形成合力。尝试以县级党委政府为主导，对各项扶贫资源实现“项目统一规划，资金统筹安排，物资统筹配置，人员统筹调配，进度统一部署”，实行“全县一盘棋”的扶贫开发战略，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致谢：项目研究得到西藏自治区扶贫办、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发改委，以及拉萨市扶贫办、林芝市扶贫办、日喀则市扶贫办、拉萨市林周县人民政府、山南地区贡嘎县人民政府、山南地区浪卡子县

扶贫办、林芝市米林县扶贫办、日喀则江孜县扶贫办、日喀则南木林县扶贫办、那曲地区申扎县扶贫办、那曲地区班戈县扶贫办等单位的大力指导和帮助。上述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同时陪同项目组成员走访调研了数十个贫困村、数百个贫困户，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感谢项目组沈振西、孙维、武俊喜、钟志明、李少伟、赵贯锋等同志的劳动。

参考资料

- 1 阎建忠, 喻鸥, 吴莹莹, 等.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地理科学, 2011, 31 (7): 858-867.
- 2 杨松. 西藏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藏学, 2004, 67 (3): 29-39.
- 3 龚弘强, 郭敏, 达吉, 等. 2010年西藏那曲地区碘缺乏病县级评估调查分析.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 2012, 27 (1): 22-34.
- 4 陈华. 试论西藏的人口与环境. 西藏大学学报, 2001, 16 (3): 29-36.
- 5 汪三贵, 郭子豪.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305 (5): 117-150.
- 6 崔占峰. 民生经济论纲——兼论农民问题是民生经济的根本问题. 经济问题, 2012, (8): 24-28.
- 7 余成群, 钟志明. 西藏农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取向及其路径抉择.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5, 30 (3): 313-321.
- 8 葛全胜, 方创林, 张宪洲, 等. 西藏经济社会与科技协同发展的战略方向及创新对策.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5, 30 (3): 285-283.

The Features, Types, Causes of Poverty and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for Tibet Farmers

Gao Xing Yao Yulong Yu Chengqu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the largest area among the fourtee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the Poverty Relief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the highest province of the poverty incidence and the sole poverty province in China.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the typical border reg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regions, and poverty regions. When we come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the great support from our country and provinces aiding for the Tibet,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 series of targeted projects, which can let herdsmen get out of poor and become r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 spectacular results. At present, the broad masses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ve already completely gotten rid of the absolute poverty.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have already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enough houses, clothes, and food. By the end of 2020,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ensures to achieve the important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long with our country. This is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maj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for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symbol for the prosperity of our country.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high-cold climate, high elevation, fragile ecology, harsh environment, and the short decades from serf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condition in the pastoral areas remains relatively weak, the industry level remains relatively low, the production method and life style of some farmers and herdsmen production is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a part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re under a stat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border areas, alpine areas, and rural areas. Because of its less family accumulation, poor resources condition,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disease, some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which have escaped from poverty basically, also have the big vulnerability, they are easy to slide back into the poverty again. Therefore,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still faces a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letely escaping from poverty for the masses of poverty farmers and herdsmen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y the end of 2014, there are still 172 720 poverty households and 674 115 poverty population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se poverty peopl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Xigaze and Qamdo cities, Naqu prefecture, and other areas. These poverty farmers and herdsmen still face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harsh surviv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ackward traffic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s, schooling problems, medical problems, employment problems, low income,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Some farmers and herdsmen are lack of the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o get rich, but rely on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divided the poverty types of the Tibet farmers and herdsmen into the fragile living environment type, poor means of production type, weak business sense type, large population stress type, defect population health type, and multiple element composite type on the basis of deep investigation.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adaptive paths and policy tools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getting rich. This study suggested focusing on the strategy of the whole village to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 Tibet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combined with the lowest life guarantee policy, so called “two system cohesion” policy, walked out of a path of precise recognition, precise support and precise invest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to drive the positive employment of the poverty farmers and herdsmen and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of self-development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reas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de. At last, we suggested that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must further intensify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in particular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nsify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verall getting rid of poverty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Keywords Tibet farmers and herdsmen, poverty types, poverty reason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高 星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地球物理学博士。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主要从事地球物理、遥感与地质灾害等方面研究。E-mail: gxing@igsnrr.ac.cn

Gao Xing Ph.D. in Geophysics,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is research mainly covers geophysics, remote sensing and geological hazard, etc. He has hosted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mail: gxing@igsnrr.ac.cn

姚予龙 男，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副研究员，人文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资源经济、农村区域发展等方面研究。E-mail: yaoyl@igsnrr.ac.cn

Yao Yulong Male, PhD in human geograph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 manag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sever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is mayor research fields are: Resource Economics, Rural area development etc. E-mail: yaoyl@igsnrr.ac.cn